

休休有容譚延闓（續完）

蔣君章

出售田宅捐獻軍餉

民國十年，非常國會選舉 國父為非常大總統，五月五日就職於廣州。未幾，下令攻廣西，廣西軍閥陸榮廷所部，到處崩潰，陸本人逃奔越南，不及三月，全桂底定。 國父乃親至桂林，組織大本營，準備北伐。先生在滬，策劃籌解湘省餉銀達數十萬之多。吳佩孚雖在民國七年，自衡陽撤軍，侈言南北和議；但其主要因素，實係直皖兩系軍閥已近短兵相接的關係。及皖系失敗，直系控制華北、中原與江漢平原，欲兼制湖南，遂師段祺瑞之故智，依然主張武力統一。他的進行步驟，是聯絡湘省的趙恆惕和廣東的陳炯明。吳陳均為秀才，這便是當時所稱之南北兩秀才攜手合作了。陳炯明時任粵軍總司令及廣東省長及陸軍部長等要職，曾電致先生，表示不贊成 國父的北伐，先生因知陳炯明必叛，其後固不出先生所料。由於陳炯明在後方作祟，對北伐軍不作絲毫的接濟，對力任 國父補給的粵軍師長鄧鏗予以暗殺。 國父乃免陳炯明的部分職務，改

道粵漢鐵路北伐，大本營設於韶關（今稱曲江），分兩路前進：一路向贛南挺進，一路則北入湖南。入湘之師，甫至邊區，而湘省各界代表，阻止北伐軍入境。由此，可知吳佩孚聯湘政策，已有相當成功。此不僅因北洋軍勢力雄厚，兼以湘省軍政人員有患得患失之心，欲以保全地位之故。惟入贛之師，進展相當順利，不僅底定贛南，且攻向吉安而佔之。時陳炯明已被免粵軍總司令及粵省省長等職，專任陸軍部長。陳部要挾 國父，恢復陳之原職。

國父因回廣州鎮攝，留胡漢民代理大本營職務。詎陳軍竟告叛變，自白雲山發砲攻擊總統府， 國父乃避往永豐艦，繼續指揮討逆軍事，時故總統 蔣公在滬，聞粵變，冒險前往，登永豐艦佐 國父指揮軍事。旋以由贛回師之北伐軍受阻，聲勢隔絕，行旣局勢，多留無益，乃奉 國父離粵返滬。先生因得與 國父往來，幾無虛日。先生曾云：與 總理常相處，得一教訓，即天下事無所謂成敗之說也，事前種種着急，皆屬多事；又云「革命領袖，非孫公莫屬」。由此

可知先生自此對 國父之認識更深。先生之以賣田宅所得五萬元，捐獻供 國父作軍餉之用，實以此故。時民國十一年，先生年四十四歲。其時直奉聯軍已打垮皖系，直軍又驅逐奉軍出關，受皖系卵翼之徐世昌因而鞠躬下台，由黎元洪復職。黎元洪改組內閣，徵先生入閣，任內務部總長，吳佩孚亦具函促駕，但皆為先生所拒。翌年，陳炯明被敗， 國父回粵任大元帥，先生則於二月間南下至廣州，就任大元帥府內務部長。由此，可知先生出處進退之大節。年譜云：

「去秋， 總理離粵赴滬，於西南軍事，遙為部署。陳炯明既據粵，自任總司令，並聯絡閩督李厚基、贛督蔡成勳，商三省會師，以消滅退集閩贛之許崇智軍。十月， 總理電令許崇智為東路討賊軍總司令，並派今 總統蔣公為參謀長。……中間， 蔣公並返滬洽商輸兵運械辦法；復假道閩南，直取潮汕，會同滇桂軍分路入粵，一月十六日克廣州。二月十五日適為舊除夕，公在滬，方有家宴，奉 總理召約，未遑暫留，即隨軍艦赴粵。」

由此，可知先生對 國父欽遲之深與奉命之敬。先生之任內政部長，便是這一年三月的事，五月調長建設部兼大本營秘書長。其時，廣東的局勢，還很複雜，軍閥餘孽，叛服無常，陳炯明尚頑據東江，沈鴻英又變亂於穗城附近。軍事倥偬，譚先生也就跟着忙碌異常。東征惠州之役，平定沈鴻英之役，先生都參與密勿，躬任其事。是年夏秋之交，吳佩孚與趙恆惕之間的關係，顯有增進，吳並欲藉之解決湖南問題， 國父乃命先生任討賊軍總司令，轄有六個軍，即：第一軍軍長宋鶴庚，由方鼎英暫代，第二軍軍長魯滌平，第三軍軍長謝國光，第四軍軍長吳劍學，第五軍軍長陳嘉祐，第六軍軍長蔡鉅猷（時駐湘西），此外還有若干別動隊等，如陳方度、唐支度、李繼珩、廖斯甲等。先生就任總司令，在出發之前，對趙恆惕、宋鶴庚等發表通電云：

「湘以飄脫自居，保境息民，尚可爲人所曲諒；若引致敵兵，自殘同志，則是甘與正義爲敵，後有千秋，何以自處？」

此電所指引敵兵自殘同志，就是指趙恆惕與吳佩孚勾結而言，蓋以正義責之也。於是先生進駐湖南，以衡陽的彭剛直公祠堂爲總司令部，發表上述六軍軍長及各路別動隊司令，湘軍第二師長魯滌平等立即響應，張輝瓚率蔡鉅猷軍二團，自湘西以奇兵突襲長沙，省城遂下，先生頗加贊賞。會陳炯明與蔡成勳聯合，阻撓北伐。蔡攻曲江，陳攻石龍，廣州頓呈緊張狀態。 國父乃命先生率師回援，先生乃整師南下。時蔡軍已陷始雄，陳軍已陷石龍，諸軍聞湘軍回援，士氣大

振，卒驅蔡軍出粵，驅陳軍返東江，穗城因得安定，時民國十二年，先生年四十五歲。其時北洋政局又有變動，黎元洪被直系軍閥所迫而下台，曹錕集舊國會議員於北京，以每票五千銀元的代價，賄諸議員而選爲總統，時人稱北洋議員爲豬仔議員，稱曹錕爲賄選總統，政以賄成，軍閥政府之腐敗，從此可知。

統領湘軍奮勇討賊

時國共合作，已告成議，國民黨容許共黨黨員以個人參加國民黨，國民黨乃改組。民國十三年一月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，選舉中央執監委員，先生被選爲中央委員及中央常務委員，大元帥麾下之各軍，改稱建國軍，並以省名冠之。先生所部湘軍因改稱建國湘軍，仍由先生任總司令。其時先生統轄的湘軍，計有五軍三縱隊，第一軍長爲宋鶴庚，第二軍軍長爲魯滌平，第三軍軍長爲謝國光，第四軍軍長爲吳劍學，第五軍軍長爲陳嘉祐，第一縱隊司令爲李抱冰，第二縱隊司令爲廖新甲，第三縱隊司令爲魯蕩平。時陳炯明殘部仍竊據東江等地區，建國湘軍奉命討賊，先生親督所部，勇猛擊敵，遂克河源。但湘軍子弟，都生長於中部地區，對粵東的副熱帶氣候，不易適應，軍中因而疫癘盛行，死病相繼，先生親往慰問，不得已而班師，先生所部，號稱五萬，但軍餉與軍械，均感困難，則以廣州餉源都被滇軍楊希閔、桂軍劉震環所把持，但先生遵守法制，嚴禁部屬染指稅捐，雖窘不顧，而其部屬亦被先生所感格，無一人敢逾越規範者，由此可知先

生的政治家的風度。 國父改組軍事委員會，任先生爲九委員之一，由此，可知 國父對先生倚畀之重，是年十月， 國父決心北伐，並親自督師，駐節曲江，而以胡漢民駐廣州，任後方調度之職。當時的北伐軍爲贛軍全部，湘滇豫各軍的一部分，其北伐聯軍總司令一職，則由先生担任。先生乃以宋鶴庚爲中央總指揮，朱培德爲左翼總指揮，盧師誥爲先遣隊總指揮。 國父勗勉先生說：「革命前途，只有進取；出兵比不出兵好，打敗仗比不打败仗好」，先生乃進駐曲江，指揮北伐全局。北伐聯軍首克贛州，直指吉安，軍鋒所至，勢如破竹。但是宋鶴庚這個一向被先生所倚畀的人，對軍事指揮，似乎有些偏激，只注重前方的進取，而不注意後方的鞏固；以致被敵軍所乘，前方根本重地的贛州因而失守，宋本人竟棄軍而遁回湘省，這是先生最痛心的事。先生乃在南雄設收容所，接待前方退回各軍，湘軍則乘此機會，作了一番整理，改爲六團，取消軍師旅長等高級頭銜，汰弱留強，以節開支，所有團長皆改由先生直轄，並設砲兵訓練處及講武堂，以安置現役及編餘軍官，講武堂堂長由陳嘉祐担任，教育長由譚道源担任。其軍餉來源，則取諸北江的稅收，按名發餉，兵無虛額，士氣因此大振，成爲革命軍的勁旅。是年，吳佩孚征關外失敗，馮玉祥稱國民軍，回師佔北京，曹錕被困，段祺瑞爲臨時執政， 國父北上參加國民會議，不幸於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於北京。噩耗傳來，南中震動。先生乃南至廣州，與故總統 蔣公及胡漢民等一面治喪，一面通電全國，誓遵 國父遺志，

繼續努力革命，人心賴以安定。國父之喪，對先生刺激甚大，憂鬱成疾，本患瘰癧，其時左股幾成廢疾，入穗時已甚痛苦，至此益劇，乃割治之，手術再施，始告痊癒，對先生之健康，影響實大。

其時，廣州的形勢，實處在滇軍楊希閔和桂軍劉震環等的控制下。二人雖在革命的旗幟之下，但其行動實與軍閥無異，其一手控制了廣州的稅捐之外，又復橫征暴斂，包辦了煙賭兩捐，故為廣州人士所深惡痛絕。楊希閔的滇軍，本為唐繼堯的嫡系部隊，裝備甚為精良，戰鬥力頗強。唐繼堯被顧聘珍所逐時，抵抗無效，乃輾轉至粵。至此，唐有回滇企圖，楊遂與唐繼堯相勾結。時黃埔軍校師生所組成的教導團，正以破竹之勢，破陳逆炯明餘孽於東江及潮汕；楊劉又深恐黨軍勝利之後，對楊劉不利，故協謀在穗作亂，遙為聲援。廣州在此種情況下，已在滿城風雨的緊急態勢了。先生與蔣公密商，決定討平大計，先將大元帥府移於河南的安全地區，先生間道至北江湘軍防區，南下，拊廣州之背；蔣公則率教導團與粵軍，自東江進迫廣州。楊劉雖頑抗，但是經不起兩路銳師的夾攻，不匝月而潰敗，遁往香港，以保殘生。廣州局面，自此始完全在革命軍控制之下，再無後顧之憂了。是年六月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，決定改組大元帥府為國民政府，改組各省建國軍為國民革命軍。國民政府委員共十六名，先生被推為委員後，又被推為五常務委員之一。軍事委員會改組，先生又被推為八委員之一。國民革命軍改組完成，蔣公任第

一軍軍長，先生為第二軍長，而以魯滌平副之。陳炯明殘部以楊劉叛變而得喘息之機會，浸浸而又謀西取廣州，並勾結駐防北江的川軍熊克武部與南路的粵軍鄧本殷部，妄圖三面對廣州壓迫前進。蔣公再度東征，指揮一、二、三軍各軍，逆襲西進之陳部，經兩週激戰，克復了夙稱天險的惠州，不二月而陳逆殘部完全肅清，熊克武不敢動，鄧本殷則退守海南。是年十一月，熊克武被扣留，所部解散，其在北江餘孽，先生命魯滌平率部掃平之。十二月，國民革命第二軍入海南島，肅清鄧本殷殘部。廣東全省，至此始全部入革命軍之掌握，乃得進一步為北伐統一的準備工作。

民國十四年，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，主席團七人，先生則為主席團之一。中央執行委員選舉結果，先生獲選，並被推為常務委員及政治委員會主席。沈鴻英部桂軍，既被逐於廣東，退至桂東北的全縣一帶，亦與唐繼堯勾結，圖謀割據，其時間略與楊希閔勾結唐繼堯的同時，大本營為對付此種逆謀，乃於十三年十二月令李宗仁為廣西綏靖督辦，以黃紹竑為會辦。中央援助李黃，廣西因此而平定。先生因有梧州之行，與李黃會商兩廣統一方案。其內容如下：廣西接受國民政府命令，處理省政，廣西軍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；廣西財政受國民政府監督，這些都是先生與廣西當局會商的結果。故先生返廣州，而中央政治委員會即通過兩廣統一案，並任命黃紹竑為廣西省政府主席，李宗仁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。是年七月，二屆中委全體會議，推

選蔣公為常務委員主席。其時的中央，分黨務會議與政治會議，蔣公率師北伐，其在中央的職務，分別請先生及張靜江先生代理。先生代理的是政治會議主席。其時，先生又被推為國民政府主席。是年六月，中央二屆中委臨時全體會議，決定北伐，由國民政府任命蔣公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，七月一日軍事委員會下動員令，九日，蔣公就職，即由先生授印。

民國十五年的北洋政局，又有新的變化。段祺瑞亦不堪軍閥的壓迫，是年四月宣告下野，北洋政府暫由顏惠慶以國務總理名義代理。時張作霖由關外深入河北山東及河南的一部分，吳佩孚擁有一長江中游及黃河中游的地盤，自稱十四省聯軍總司令，由直系軍閥分離出來的孫傳芳，開府南京，自稱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。吳佩孚與孫傳芳為北伐軍的正面敵人。其時吳佩孚的影響力已及湖南，湖南省長趙恆惕部下的第四師長唐生智，與趙恆惕之間裂痕頗深，趙密謀對付之，唐則投於革命旗幟之下，接受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的任命。北伐軍在湖南有了唐生智作開路先鋒，故以湖南為北伐的第一目標，對孫傳芳則採取監視的態度。在北伐計劃中，先生所屬的第二軍與朱培德的第三軍，隨同蔣總司令北伐，但頓兵於湘贛邊區的茶陵、攸縣、醴陵一帶，即係對孫傳芳作監視與警戒。先生命教導所留粵訓練，命魯滌平代率四、五、六各師隨蔣公北行，臨行，諭魯曰：「前方軍事，託以全權，有須用延閣名義者，請逕行之，不遙制。」先生對魯信任之深，由此可知。

北伐軍入湘之後，克長沙，汀泗橋一役，已奪吳佩孚軍之魄，於是。圍武昌，克陽夏，北進至武勝關，勢如破竹，這一戰戰事告一段落，乃對第二敵人孫傳芳作兩路攻擊。先是，對孫傳芳採取監視的，尚有何應欽所率的第一軍的一部份，屯兵於韓江流域，時周蔭人任閩督。湖北戰爭告一段落後，蔣總司令親率大軍自湘東入贛，對贛方的孫軍作總攻，何應欽亦率東路軍入閩，萬壽宮一役，已奪孫軍之魄；而東路軍亦於松口之戰完全勝利。這兩方面的軍事，均呈破竹之勢。南昌既定，蔣公電先生主張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應速遷武漢，先生因於是年十二月十一日自廣州出發，三十一日抵南昌，與蔣公相晤，盤桓至三月初旬，始抵漢口。北洋軍閥在吳佩孚節節敗退後，組織所謂安國軍，推張作霖為大元帥。孫傳芳自江西敗後，自知非國民革命軍的對手，乃投於張作霖的懷抱，請其援助，張作霖乃命褚玉璞軍進駐南京，作為對孫傳芳的支援。

武漢清共出力最多

中央遷至武漢之人員，分為兩批，隨先生北上者為第二批。其第一批人員之抵武漢者，無論黨部與政府，都被共黨分子滲透，接受俄顧問鮑羅廷之指揮操縱。鮑羅廷對於北伐，本採陽示讚成，陰謀阻撓的策略。及其陰謀不逞，乃乘中央黨政機關北遷的機會，使用竊據篡奪的陰謀，轉變國民革命之領導中心。此種陰謀，先生殆早有所聞，其滯留南昌而不即去武漢，殆以此故。十六年二月中央政治會議議決遷徙案，始於三月七

日離南昌而至漢口。其遲遲不行而終於去漢者，殆得蔣公之同意而為武漢分共之伏筆歟？此可在此後武漢的分共運動中先生實為中心人物，可以窺知其中的消息。

民國十六年是國民黨清共與分而復合的關鍵。蔣公於定都南京後，即清除共黨分子；武漢以先生為中心的部分中央委員則在七月間兩次發表聲明，嚴厲指斥共黨分子的逆謀，毅然實行反共清黨，其進行的時間後於南京約三個月。此中原因，則以武漢的中央黨政機關，均有共黨分子混入，不能不從事於反共的中央委員聯絡之故。先生年譜，有云：「公斡旋於反復支離之局勢中，舉手投足之間，無一而非世局國脈所關」，由此可知先生在武漢清共運動所處地位之重要性。在底定江南的北伐期間，先生所轄的國民革命軍第二軍，由魯副軍長率領，隨蔣公北伐，擔任對孫傳芳江西部隊的警戒與監視。及蔣公揮師入贛，第二軍隨同作戰，所向克捷。及江南底定，乃自贛東入浙，與東路軍合力攻浙，歸東路軍指揮，浙江底定後，則歸江右軍總指揮程潛指揮，參加攻取南京之役。第二軍始終隨蔣公作戰，由此可知先生身在武漢，心在京滬了。南京光復以後，第二軍輾轉戰於皖鄂之間，建功甚多。中央乃將第二軍擴為兩個軍，即從第二軍中分出一個十四軍來。至此，先生始解第二軍軍長職務，魯滌平擢二軍軍長，陳嘉祐任十四軍軍長。中央對第二軍依畀之重，由此可知。

出任國民政府主席

武漢既行清共，寧漢之間的基本政策，遂相一致，於是雙方進行團結會議，寧方由居正等為代表，漢方由先生及于右任等為代表，在廬山進行會商，結果圓滿，先生遂乘軍艦赴京。時孫傳芳的江北殘部正渡江猛撲，其左路則在南京之上游亦謀渡江，因對江面發砲，而先生座艦適在此時經過，先生從容鎮定，行若無事，卒能安全抵京。先是，國民政府是在是年四月十八日定都南京，中央政治會議發表宣言，以遵奉國父遺命為號召，並將迎奉靈柩歸葬於鍾山之下。隨即舉行各團體祝捷大會，歡迎先生返京，行使職權。至此者多；先生抵京後，不久即赴上海，挽胡漢民返京，協力組成中央特別委員會，推動黨政工作，完成國民黨之團結。翌年召開國民黨二屆中委第四次全體會議，會中決定修改國民政府組織，改委員制為主席制，明定國民政府受國民黨中央執行會之指揮與監督，並遵國父遺教，設立監察院與考試院，完成五權憲法的構想，先生則推為國民政府主席，不久又在四中全會後代理政治會議主席，時先生年五十歲。

寧漢自分立而團結的過程中，蔣總司令下野，四中全會前後復職。十七年四月一日，蔣公督師北上，進行第二期的北伐，以津浦鐵路一線為正面，由蔣公親自指揮。大軍所向無敵，五月一日佔領濟南。日本軍閥深忌中國的統一，在第二期北伐開始時，即以保僑為藉口，移其福田師團於濟南，阻撓國民革命軍前進。五月三日慘殺我濟南交涉員與軍民甚多，是為五三慘案。中央

政治會議，推先生北赴徐州，與蔣公會商國是。當時我們的國策，以「不屈服、無抵抗」為原則，繞道濟南，北渡黃河，五月十七日克德州，六月二日克滄州。北方的所謂安國軍已知無法與國民革命軍作戰，張作霖於六月四日倉皇出關。日人對張作霖之出關，深惡之，乃預置炸彈於皇姑屯車站炸斃之。國民革命軍六月五日佔北平，十二日佔天津。張作霖之長子學長繼統東北軍，於十二月宣告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，接受國民政府命令。紛擾割據多年的國家，至此統一。是年十月，中央遵照建國大綱的規定，宣布訓政時期開始，頒布訓政大綱，修正國民政府組織法及五院組織法。國民黨中央常會議決任先生為行政院院長，自此即以行政院院長終其生。

十八年一月，先生以行政院院長身分，發表演說於中央政治會議紀念週，闡述循禮守法的意義，冀以此達成中國政治之改革。這一篇演講詞，可以看作先生的施政方針，時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，先生年五十一歲。時舊曆尚為十一月，十四日為先生五十一壽誕，其長公子伯羽夫婦率孫女自柏林返，特為先生祝壽，長公子去國已多年，時尚未成婚，故此大返國，先生既見媳，又見孫女，精神最為愉快，是年三月，國民黨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揭幕，先生為九位主席團之一，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及中央常委。四月，以風疾赴上海休養，住宏恩醫院者三個月。病中又臨麻姑仙壇記二百又三遍，此為先生最後之臨帖，公餘事書，病中又事書，先生是最善於利用時間的黨國要人之一。六月一日，國父靈柩移葬於南京紫金山

之陽，其碑文為先生所撰，紀念碑「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於此」，亦為先生手書。九月病癒，由次女公子祥侍返南京，移居於成賢街的一座西班牙式的洋式洋房，右為中央大學本部，左為中大農場，朝夕聞弦歌之聲，一樂也。

民國十八年，國內又成多事之秋。時國家統一，海內宴如，政府為節省軍費以便致力於建設，於是召開編遣會議，縮減軍隊。但是舊軍閥之搖身一變而為革命軍者，掛革命軍的招牌而意欲為新軍閥者，皆採反對態度。李宗仁首倡反對之議，閻錫山、馮玉祥繼之，黨棍子汪兆銘又附和之。四方面聯合為亂，召開所謂擴大會議於北平，閻馮李等並有電要求與蔣公一同下野。先生與胡漢民、王寵惠等發電痛駁之，蔣公則率大軍馳騁於中原戰場，至十九年十月閻馮等下野，國家始重歸統一，是年九月二十一日午後，先生作書數通，一致弟瓶齋，一致長女淑，一致內姪方世洪，一致沈文肅葆楨之子演，書竟，出觀盤馬（先生最喜看馬），途中猝患腦溢血症，急言須至總理陵，但至中山門已不能言語，乃返成賢街寓所，昏不知人，延至二十二日而溘然長逝了。

蔣公聞訊震悼，全國人民聞之，亦莫不以失此慈祥愛民的政治家而悲動。國民政府特令褒揚，並撥治喪費一萬元，令鈕水建等為治喪委員，國葬先生於靈谷寺之東，是即後日成首都故跡之一的譚墓，蔣公親題碑石曰：「國民政府委員行政院長前國民政府主席譚公延闓之神道碑」，蓋殊榮也。國葬後，刊有譚故院長國葬典禮

紀念冊，其日記、詩文、文電等皆由長公子伯羽搜藏於上海赫德路寓廬。國葬紀念冊載有先生事略一文，甚簡要，蓋敘先生生平之大事而已。國史館是否已為先生立傳？皆待查；其存滬寓之資料，不僅有關先生行誼的原始資料，且亦為那個時期的國史之部分原始資料，如有損失，則誠國史之重大損失了。我們但望它完整無恙。

佳言卓行足資矜式

胡漢民先生是在黨國要人中的至好之一，自民五在滬訂交後，公私情誼，與日俱增。先生逝世時，胡氏任職立法院院長，曾在立法院的紀念週中，作追悼先生的報告，茲摘錄其要點如下：

「……上星期一，譚組安先生不幸急病逝世，這是黨國的大損失。……譚先生的人格和事業，在我們革命過程中，總是不可多得的二人，兄弟今天在十二分痛悼之餘，想提出尤其值得我們則效的幾點，與各位共勉：

譚先生休休有容，具有古人所謂宰相的氣度，他的性格，祇有和平中正四個字，可以得其大略。兄弟與譚先生相處十餘年，從未見其疾言厲色。有時有人為什麼問題互相爭持時，譚先生一來，往往令人意消；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，一經譚先生區處，也就十分妥貼了。所以有人視譚先生為藥中甘草，幾於攸往咸宜。但是，譚先生在我們工作中，不僅是隨便配合的甘草，而是在配合之後，能使我們的工作，發生偉大的效能，顯出異常適當的工作的。……譚先生天資明敏，自小便能以能文章為士林所稱賞，而其精到練達，更非普通人所能及

。少時，在兩廣督撫幕中，遇到疑難的公事爲他人所不解的，祇有譚先生瞭如指掌；而且區處條理，都能恰合分際。但譚先生生平，絕不願以此見長，他的一切，都蘊藏而不外露。……譚先生雖然和平，但在緊要關頭，却又大節凜然，從沒有絲毫苟且。……古人通而有節之說，也正是譚先生絕好的評語。

譚先生對於總理，常自恨其直接承教之晚，但他之於總理，真可以說心悅誠服的一人。他自民國八、九年開始追隨總理，其後到廣東，……便人人都感覺到他是將來本黨的棟樑。有時他參與機密，決定大計，有時以一身負天下之重，但譚先生從不以此自炫，……這種惟重實際、不尚虛名的精神，正可矯正一切躁進者盜名欺世的惡習。……

民國十年，譚先生既到廣州，便要回湖南驅逐趙恆惕，總理許之，他便問道入湘，依照當時的情形，本可規復長沙。可是陳炯明在東江突然作亂，……當時省城兵力單薄……便飛調譚先生回粵。譚先生奉召，盡棄了規復的各地，星夜來援，廣東大局，才賴以安定。譚先生既回，當時廣州各軍的力量，便以譚先生統率爲最大，……於是滇、桂、黔各軍以爲譚先生必將危及他們的設施，都人人自危，可是先生回粵以後，便再三聲稱現在敵軍既已退回東江，我們也不該逗留後方，自甘暇逸；應該趕緊前進，將敵人消滅，掃除我們革命的障礙。當時註省各軍都不爲動，祇有譚先生獨提湘軍，努力猛追。……於此更可見譚先生服

從總理、矢志革命的一斑。

東江未定，總理又調湘軍回大本營！當時在大本營的各軍，軍紀之好，以湘軍爲最。十二年，總理北上，臨行交下兩個命令：一、命譚先生代負北伐的軍事；二、命兄弟留守廣州，代行大元帥職權，並負責肅清東江。兄弟便到總理跟前，對總理說：……據我的推測，肅清東江，可不成問題，……至於北伐，便不能不替組安爲難。……總理說：一切的事，我都知道，你們儘管去做吧。……總理北上以後，兄弟便找譚先生商量東征、北伐並處理廣州善後計劃。譚先生慨然負起總理所交與北伐的責任。他說：既是總理主張了，不管難不難，我們不能贊一詞，祇有努力去幹。……這種效忠主義，堅強不屈的精神，真可爲我們的法式。

其後，總理病危在北平的電報到廣州，兄弟即日找到廖仲凱、伍朝樞諸同志和當時代負軍政責任的同人，告以總理病狀，共商善後大計，並說：大元帥職權，實不當再行代理，最好能將大元帥府根本改組爲政府，並採用委員制，使全體同志，能有共同負責的機會，廖仲凱同志等便統統贊成。及後，我們得到總理逝世的消息，譚先生也正從北江回來，兄弟便將所定的計劃告訴他，他沉思有頃，便很嚴正的告訴兄弟：你的計劃是對的，可是此刻萬不能行，請你再勉爲其難吧！其態度的堅決，真爲兄弟所少見。兄弟當時本知道如果馬上更張，一定會發生糾紛，自聽了譚先生的話，祇好暫

時不提起了。……次日晚上，兄弟和譚先生在楊希閔處吃飯，譚先生非常興奮感慨，大發其我們聞所未聞的言論。他首先痛責自己，數陳自己的錯誤；並說：孫先生在世的時候，我們祇是一知半解，遇到任何困難的事，還可向他請示，可是胆小而無知，我們常常狂傲自大，不肯切實服從孫先生的命令，這真是罪大惡極，萬無可恕的地方。現在孫先生死了，一知半解的我們，更失了指導的人，我們今後應該怎樣努力，才能免爲孫先生的罪人呢？又說：我一生佩服的祇有孫先生……便是我的同鄉黃克強，也祇佩服得一半，今後大家如果祇圖私利，不能遵照孫先生的遺教，完成革命，便是孫先生的叛徒。這一席話，真是大義凜然。當時楊希閔等統統在座，也相對默默。普通人祇知道譚先生不善辭令，却不知道他能時然後言，而事實上又往往由他中節之言，呈顯出偉大的功效！

當十三年，譚先生從東江回來，兄弟……很不經意的說，關於軍事，現在繼起有人，我們也終於攬不慣，將來如有機會，還是回復我們書生的生活。……十七年，兄弟自海外歸來，與譚先生見面，……譚先生首先和兄弟說：胡先生，你的書生不帶兵主義，我現在已經實行了。……在軍事上，他曾作過總司令，總理北上，並曾主持北伐事宜，在政治上，他做到國民政府委員，並當過主席，但譚先生從不介意到名位和權力。……當十五年我出師北伐，公舉 蔣介石先生任總司令，其實譚先生

的資望歷史，都比 蔣先生好，譚先生却欣然做北伐軍第二軍軍長。固然，資望比 蔣先生好，乃至努力革命，甘心下人的，本不止譚先生一人？……但由譚先生如此，即有一、二不明大禮的將領，也不敢再有違背了。……

十七年秋，兄弟回國，向中央各同志建議設立五院，以應革命的需要。當時譚先生便忘了他主席的地位，很誠懇的對兄弟說：假如我還能服務，可否給我做些考試的事？最後，我們推定 蔣先生為主席，譚先生為行政院長，他也就慨然不辭，切心為行政努力了。譚先生的字典中，大抵沒有名望權利等字樣，他是真能行總理以服務為目的、不以奪取為目的的遺教的。這種鞠躬盡瘁，效死黨國的精神，真可為今日一切專事奔競的青年同志的模範。……

譚先生從前豪飲健飯，因此凡找到醫生，如果許他飲食自如的，便以這位醫生為通達；如果為他多立戒條的，他便以為不行。他說：我以前吃錯喝錯，何必現在戒它，反令我感受痛苦呢？有一位醫生曾為譚先生作精密的診斷，結果告訴譚先生說：依你的病狀，將來有兩個死法：(一)得急病——腦充血而死；(二)由半身不遂而死。譚先生告訴兄弟：這兩個死法，假如由我自擇，我必定選擇第一個。……：這個事實，我們……仔細想來，則譚先生實有其人生觀，……：在譚先生抱定生與死為萬物變化之迹，為人所不能逃，如果悅之惡之，甚之

為苟全命計，勉強節制，便全然沒有生趣了。……：兄弟以為一個有抱負能做事業的人，對於生死，必定總有一個超人的見解；不過假如普通人本沒有知識，却不能以此藉口，以致放縱頹廢，弄到馬援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，這一層是大家應有的認識。……：「

胡氏風骨嶙峋，知人論世，少所許可，獨對譚先生推崇若此，而且他許多見解，都根據他親自經歷的若干革命祕辛，由此益可見譚先生的偉大處。

至於先生的「吃錯喝錯」，實與其掌廚有關。掌廚者非他人，即當時著名的曹廚子。此人燒得一手好菜，善伺主人之意，隨時聽從指點，精益求精，當時譚公館的菜餚之精，聞名於南京。一日，張道藩先生慕其名，當着譚畏公的面，請他做幾樣菜，譚畏公即囑曹廚子出，道藩先生授以銀幣四十枚，當時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，普通魚翅席，十五、六元即已不錯。詎廚子接銀在手，拋之不已，意甚勉強，弄得張道公不好意思。及期菜出，不過五六味，果然樣樣精緻，嘗所未嘗，大快朵頤，與宴者大家稱快不已。胡遜叟耐安先生在譚畏公幕任祕書多年，在廣州時，有時伴譚畏公進餐，亦稱其口福不已。由此，可知曹廚子做的菜，使譚畏公胃口大開，他的豪飲健飯，當與曹廚子做的好菜有關。據說曹廚子一直稱譚畏公為三少爺，及其貴為國府主席及行政院長，亦不改稱云。台北市的湘菜，亦極著名，主其事者為彭某，以譚廚為號召，舊日的天長樓、玉樓東等，以及今日的華湘等，均為彭某所主，聲譽頗

高。一日，譚畏公之長公子自國外返台北，親友為宴款待，約彭某親來做菜，席間並介紹做菜者為譚府舊人，伯羽先生命出相見，則謂：此乃我家選菜洗碟之副手。副手之手藝已如此可觀，則曹廚子本人之手藝若何？可不言而喻了。譚畏公享年僅五十二歲，曹廚子之忠心侍主，其所得結果相反。此在譚畏公的人生觀視之，固無足輕重了。

作者對譚畏公欽佩至深，但一聆其言論者僅一次，時為十六年秋季第四中山大學開學時，先生以國民政府常務委員身分，出席致訓，其雍容大度之風采，已予人以深刻的印象，其詞簡賅，但其勉勵學生勤治學問，為建國工作而努力，句句出自肺腑，感人至深。十九年下學期，作者執教於上海聖瑪利亞女校，其三女公子韻在高三國文班，時先生已謝世，但見其綴白花於髮際，頗令人回憶畏公之風度不已。來台後，一度兼中華日報，時譚畏公長女公子淑為書畫展覽事，由郭外川學長之介，相識於席間，事後承贈法書一聯及紅梅立軸，鐵畫銀鈎，饒有麻姑仙壇意味，蓋家法也。畏公曾有句云：「書來女勝男」，洵不誣矣。

譚畏公對黨國之貢獻，因為他深藏不露，故當時知者已不多，近讀黨史會出版的革命先烈先進傳，雖有譚延闓事略並附胡漢民先生在紀念週的紀念詞，仍嫌其所述過簡，乃詮次其事蹟，作較詳的介紹，但資料不足，掛漏之處仍所難免，但作者本意，在使此一代偉人之佳言卓行，能為後學所了解，所取法而已。